

重訪摩登上海：以情感的方式

● 唐小兵



葉文心著，劉潤堂、王琴譯：
《上海繁華：都會經濟倫理與近代中國》（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

2010年在中國絢麗登場的世博會象徵着上海的繁華；然而，如此絢麗的繁華在同年11月15日上海膠州路教師公寓的火災映襯下，顯得

如此灰黯而脆弱，繁華似乎內在地隱伏着不安。在這樣一個悲情的背景下閱讀葉文心的《上海繁華：都會經濟倫理與近代中國》（*Shanghai Splendor: Economic Sentiment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1843-1949*，以下簡稱《上海繁華》，引用只註頁碼），似乎充滿了一種隱喻的意義。其實，上海這個城市本來就充滿了各種悖論性的隱喻，比如無產階級革命起源地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就與資產階級式的消費主義天堂新天地比鄰而立。

《上海繁華》不是一本經濟史著作，而是一部文化史之作，通過對上海故事的講述，來重構一座城市的歷史記憶。之所以說是「重構」，是因為作者自覺地與那些為1990年代以後上海的發展模式背書的龐大研究團隊「劃清界限」；儘管作者其實也在大量地引用後者的上海史研究成果，但她對於瀰漫在上海的懷舊情調，更是有着冷靜的審視和批判的視角。正如作者在結語中所言：

《上海繁華》通過對上海故事的講述，來重構一座城市的歷史記憶。之所以說是「重構」，是因為作者自覺地與那些為1990年代以後上海的發展模式背書的龐大研究團隊「劃清界限」。

《上海繁華》關切的是將上海史書寫的鐘擺從「物」重新調校到「人」——將普通人而非青幫、明星、名流、權貴的命運、歡欣與苦難等情感，聚焦在歷史的顯微鏡之下。

甚麼樣的城市珍惜它的記憶？鴉片戰爭以後的上海一貫求變求新。上海素來不是記憶可以盤垣〔桓〕的場所。上海追求摩登，上海也追求革命。無論是資本主義的繁華還是社會主義的革命，在二十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這個城市都以否定自己的過往來衡量自己的進步。……這個城市記憶的構築，很難說到底為了甚麼。然而有一點是沒有疑問的，就是這種對上海史的書寫，有着明顯的功利目的。城市歷史敘事的書寫不僅能豐富對城市未來的憧憬，而且也能支撐其當下行為政策的合法性。（頁292-93）

批判與反思自然是任何一個人文主義者應該具有的價值底線，但歷史寫作絕對不能等同於意識形態的批判話語。歷史書寫的魅力正在於通過刻畫具體的人事與細節，來展現一種理解之後的內在反省。在琳琅滿目的上海史著述中，《上海繁華》顯得如此別具一格，原因就在於它既不像《上海摩登：一種新

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般駐留在對上海物質文化空間無保留的描摹與念想之中^①，也不同於《危險的愉悅：20世紀上海的娼妓問題與現代性》等著作注重將「底層敘述」（而非底層的個人化故事）從塵封在檔案館裏的落寞時空中挖掘出來^②。《上海繁華》關切的是，在近代上海的社會變動中，居留上海空間裏的個體如何理解、因應和承受這一切。它將上海史書寫的鐘擺從「物」重新調校到「人」——將普通人而非青幫、明星、名流、權貴的命運、歡欣與苦難等情感，聚焦在歷史的顯微鏡之下。

換言之，葉文心的核心目標乃是通過對歷史文本的細讀與歷史脈絡的重建，考究1840年代上海開埠直至1949年這段百年歷史之中，上海的中產階層與資本家群體是如何合作起來建構一套經濟倫理文化，來為其商業性的社會屬性和個體行動提供合法性。大體而言，這種努力從兩個層面展開：對外，這兩個群體通過建構一套愛國主義論述，



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

即晚清以來所謂的「商戰」模式，來凸顯積聚財富對抗列強的必要性；對內，以白領為主體的中產階層往往受過良好的教育，他們以知識為基礎，形成了一套不同於傳統商人的職業操守和經營方式，新式學校教育與職場文化幾乎完美地對接起來。

葉文心通過對中國銀行職員的研究，呈現出上海的典型白領在一種高度同質化的工作程序和生活模式之下的「內心的焦慮」。他們勤奮地學習專業知識，「一個受訓者的課程經常是從早到晚都被安排好了。他在特定時間起牀，學習使用算盤和計算機，還要學習英語課程，用中文練習寫作和書法。他閱讀正當的雜誌、書籍和報紙，以有益於思想。和舊式儒家學堂以及現代日本銀行相似，他們被要求寫日記。日記需要記錄日常活動、個人行為以及個人思考，且每天提交給經理一師傅檢查。」(頁124)在中國銀行所標誌的公司文化中，鐘錶成為提醒、分割甚至強迫個體的時間刻度，「時間」不僅是機械化的指示，更賦予了道德的意義。在這種公司文化中，人們從持續不斷地感受滴答的鐘聲中獲得紀律感和前進的動力，這樣的紀律能夠幫助和完善人們對永恆目標的更高感受，其結果導致了家長制，並強化了現代職業知識的實用性和儒家規範歷久彌新的正當性。在現代上海的成長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現代專業知識與傳統儒家人格居然可以如此精密地結合，當然，公司文化所沿襲的儒家文化更多地是其服從、勤勉、自我反省的一面，而非抗議、自主人格的面相。

在時人或者今人的視野中，公司白領顯然是職場上最成功的群體之一——收入豐厚、生活舒適而安定、擁有崇高的社會地位等。然而，葉文心通過對《中行生活》這份銀行內部刊物的文本閱讀，發覺這樣的一個成功人士群體內部，其實瀰漫着焦慮、厭倦和不安的情緒，而這種情緒的根源在於對企業這架巨型機器的「異己感」和「疏離性」(頁129-32)。企業編制了現代性的牢籠和單一的集體組織生活，而人們卻注定不想永遠做那隻尼采(Friedrich W. Nietzsche)戲謔的尋找籠子的鳥兒。他們試圖通過對開設鄉村銀行的想像與規劃，對自然生活的神往與訴說，來釋放在大都市裏道貌岸然的秩序與穩定的生活背後的深度壓抑感。可是，這樣的釋放卻因抗戰的爆發而無疾而終。

與這種標準化的時間刻度對應的，是王笛在《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與微觀世界(1900-1950)》一書中所描述的「反抗現代性」的另一種「時間」，即一種時間感消逝或者淡忘的自由自在的閒散和漫談^③。在《上海繁華》中，葉文心指出人們通過對時間的處置、分配和規劃來謀求幸福，而這樣一種理性的規劃自身，恰恰可能帶來深層的自我壓制。令人驚異的是，這種企業的組織模式以及個人在集體組織中的生活經驗，在葉文心看來，恰恰為1949年之後上海高度單位化的工作、生活模式，提供了平穩的過渡管道。由此可見，社會主義的上海與資本主義的上海之間，其實並非全然的斷裂關係(這正如資本主義的摩登上海與傳統中國的儒家社會也血脈相連一樣)，而是存在隱蔽的延續，

社會主義的上海與資本主義的上海之間，其實並非全然的斷裂關係，而是存在隱蔽的延續，包括強調個體的內在德性，以服從企業這樣一種「積極的不自由」人格，都是顯而易見的異曲同工。

上海的小市民看似在世界的囚籠中解脫出來，而其實又跌蕩到另一個奴役自由意志的牢籠。個體的家庭苦難並未得到實際性的紓解，而只是在民族國家的敘事中被一種亢奮的意義感所遮蔽和塗抹了。

包括強調個體的內在德性(既包括職業能力的自我拓展，也包括組織紀律性的強化和內在化等)，以服從企業(或者單位、國家)這樣一種「積極的不自由」人格(頁137-38)，都是顯而易見的異曲同工。

《上海繁華》花費了相當的篇幅討論《生活週刊》和《讀書生活》。這兩份雜誌作為文本空間，呈現出上海人日常生活的情景與困境。《生活週刊》由鄒韜奮主持，其中有一篇對讀者來信的回應，關注如何幫助一位居留上海的職業青年，建設一個具有可預期的美好生活願景的核心家庭(頁163-69)。這一故事講述了個體如何突破傳統的限制和家族的羈絆，建設一個基於個體奮鬥和工作倫理的小家庭。在這樣一種敘事中，鄉村絕對不是中國銀行職員所設想的那樣溫情脈脈和田園詩意。

《生活週刊》展現的「中國廣大鄉村內地處於饑荒、洪水、強盜橫行、軍閥交戰、士兵搶劫、農民暴亂、鴉片吸食和賭博成癮的惡劣環境下。相較之下，城市不僅是一個工作和機會的空間，也是一個妥善規劃的空間，有林蔭大道、公園、私人花園、霓虹燈、絢麗的商店門面、熙熙攘攘的娛樂區和高聳的寫字樓等等」(頁171)。城市成為破敗鄉村的救贖主體，而作為城市中的主體，中產階層重視小家庭，重視道德修養，重視自給自足的工作倫理。對於《生活周刊》來說，這樣的理念不僅能夠成就個人幸福，而且對於「締造健康社會」和「人民幸福」都是可取的(頁172)。

而在由李公樸等人創辦的《讀書生活》的話語空間裏，生活在城市中的個體的苦難，則成為日常化

的創傷性記憶。一個《生活週刊》所設想的幸福小家庭，在都市洪流的變動中稍微遭遇到風吹雨打便不堪折磨；尤其是作為家庭支柱的父親的離世，往往將一個家庭拖入貧困交加的深淵。這種中產階層小家庭的苦難敘事，呈現了極度的內在脆弱和不穩定性。葉文心通過對大量讀者通信的閱讀和勾連，發覺刊物編輯有意引導讀者將這種個體性的家庭變故及其帶來的痛苦，與中產階層在資本主義摧折下的固有風險結合在一起，從而使個體敘事開始被整合成階層敘事，進而變成民族國家的反帝國主義宏大敘事(奇怪的是反封建主義敘事在此不見凸顯)，激進的左翼論述由此而獲得了嵌入的可能。

正如作者所言，《讀書生活》透過描繪洪水、乾旱、饑荒、經濟蕭條、戰爭這類悲慘的畫面，誇大地傳達恐懼、貧窮和絕望的聲音(頁211)。透過刊登讀者的故事，也讓這些個體看到他們在困境中並不孤獨。該雜誌透過不斷重複的信息強調：任何單獨的個人都看不到光明的前景；資產階級那種有朝一日步入小康生活和社會上層的美夢，注定會落空。對於孤兒寡婦和沒有家庭保護的人來說，努力工作和具備良好品德並不能保證他們能生存下去。這些不幸遭遇的真實原因，是中華民族面對帝國主義和全球資本主義的進逼，因此任何人都無法倖免於不幸的命運。擺在小市民面前唯一可行的行動路線，就是團結起來，將自己變成愛國者和戰士，為了保家衛國而反抗侵略者。對於那些喪父的人來說，深陷於悲痛之中是沒有意義的，更重要的是

成為愛國人士，為了生存而立即奮鬥。透過為國家奉獻生命，他們給自己找到了一個戰鬥的機會。

在這樣的一種敘述中，小市民的主體性呈現出一種悖論的狀態：一方面，小市民不再陷溺在個體性的私人生活的苦痛之中而無法自拔，訴苦作為救贖自我的方式徹底喪失了其意義和正當性，個人被提振到拯救民族國家的崇高主體的位置，生命的意義從庸常而瑣碎的日常生活裏提升出來，這是主體意志的張揚；而另一方面，從民國上海中產階層的日常生活中提拔出來的個體，卻並沒有在民主憲政的框架下成為權利本位而意義自足的個人，他們仍是無法成為意義的來源（傳統的多元的意義世界已然崩潰），而只能黏附在國家敘事的譜系中來證成自我的意義，甚至成為成就民族國家的工具性存在，這樣一種價值偏向其實又在深度壓抑個體的自由與解放。

簡言之，上海的小市民看似從此在世界的囚籠中解脫出來，而其實又跌蕩到另一個奴役自由意志的牢籠。真真是如盧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所言，「人生而自由，而又無往不在枷鎖之中！」事實上，個體的家庭苦難並未得到實際性的紓解，而只是在民族國家的敘事中被一種亢奮的意義感所遮蔽和塗抹了。正如西哲狄尼森 (Isak Dinesen) 所言，所有的悲傷都可以忍受，只要將它講述成一個故事或者放到故事（這個故事的上海版本就是民族國家的故事）裏來講述^④。

因此，潛伏在《上海繁華》中的一條核心主線，是作為現代中國中產階層的上海市民如何從原來的帶

有一定文化保守性和政治惰性的群體，因社會政治的鉅變、民族危機和公共輿論的影響，加上個體生命的日常侵蝕，而逐漸地左傾和激進（這也包括《生活週刊》的主編鄒韜奮）；以及一個注重創意產業、景觀文化和享樂主義人生觀的資產階級的上海，是如何趨向無產階級化的。葉文心認為抗戰時期的變動特別值得留意，與汪偽政權、日本合作（或者不公然抵抗或消極抵抗）的各類大公司高層的家長制的道德權威，在民族主義的潮流激蕩下，迅速地褪色、弱化乃至蕩然無存，「年輕的職員和初級學徒不再忠實於上級和下級之間的階層依附關係，也不再看重周圍長輩的道德權威，他們和一起工作的夥伴建構了基於平等聯繫的兄弟情誼。他們不再重視工作場所的家長制和管理者的道德典範，希望自己能夠代行其事，他們要求公司表示關心和幫助，並提供員工支援。」（頁228）

當然，僅僅用民族主義來解釋這個轉變是如何發生的，也許稍顯單薄。從此前的儒家式的等級體系，發展到如今的平等主義訴求（甚至赫然彰顯出一種工人政治反抗的底色），有無民國上海企業發展的內在邏輯以及工人階層的自我啟蒙等因素的發酵？更關鍵的問題是，《上海繁華》是一本關注小市民的日常生活的歷史著作，而通觀全書，這種關注仍舊太多地停留在從文本到文本的敘述。在這一點上，《上海繁華》有點類似季家珍 (Joan Judge) 的《印刷與政治》 (*Print and Politics: "Shibao" 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 一書^⑤，可謂是聚焦於一種「文化史」或者「觀念史」

潛伏在《上海繁華》中的一條核心主線，是作為現代中國中產階層的上海市民如何從原來的帶有一定文化保守性和政治惰性的群體，因社會政治的鉅變、民族危機和公共輿論的影響，加上個體生命的日常侵蝕，而逐漸地左傾和激進。

上海既是中國現代性展開的最典型的區域，又是傳統儒家倫理被移植、嫁接和挪用得最成功的地方；上海既有資本主義的消費文化的摩登面相，同時又有無產階級的抗議政治和左翼文化的生產。

中的日常生活，而小市民的基本生活狀況，以及政黨力量是如何滲透到安於現狀（就政治領域而言）的小市民階層等「社會史」問題，如果得不到必要的清理以及視角的下移，就可能導致一冊關注人們的希冀、創痛與悲喜的歷史著作，最後仍舊只是書寫了各類人物的話語而已。

《上海繁華》最突出的特徵就在於，它寫出了民國上海的兩歧性：上海既是中國現代性展開的最典型的區域，又是傳統儒家倫理被移植、嫁接和挪用得最成功的地方；上海既有資本主義的消費文化的摩登面相，同時又有無產階級的抗議政治和左翼文化的生產；上海既有着海納百川、兼容並蓄的巨大吸納能力，各種文化都在這裏輪番登場，同時似乎又形成了獨特的海派文化特質。上海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既是保守的，又是激進的；既是浪漫的烏托邦，又不乏工具理性意識的痕迹。而能夠穿透這一切悖論的，似乎又是利益和算計的商業本能：在利益驅動下，任何資源，無論是民族的、世界的、左的、右的、烏托邦的、現實的，都可以被最恰當的形式利用，而着眼於產出效益的最大化。

或許正因為此，民國上海成為歷史記憶最多元的一個近代城市。在穿越了漫長的上海史後，葉文心意味深長地寫道：

在某種程度上，歷史——或者被銘刻為一種特殊形態的「歷史」——已經和這個在與世界接軌過程中不斷追求物質發展高峰的上海，不再有多少關聯。我們應該感謝上海的歷史學家，是他們將這個城市從長期以來的歷史敘事中解放出來，這

種歷史敘事始終站在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民族主義反對殖民主義的二元對立角度。從歷史的負擔中解脫後，上海快樂地達到了一種幾乎「失重」狀態。這兒不再有反對資本主義或者殖民主義罪惡的強制性譴責。取而代之的，任何有益於上海物質發展的事物都擁有必然的道德正當和歷史正確。

同時，這種「輕鬆感」也在公共話語中為一些多樣化的少數敘事提供一個空間。這些零散性的敘事主要是一些歷史親歷者的對過去的體驗和回憶。所有人都競相爭取在城市記憶中獲得一個位置。最終，所有人都問這個問題：誰擁有上海並有權發出上海的聲音？（頁302-303）

這樣的上海，也可以稱之為一個「人性的煉爐」。

註釋

- ① 李歐梵著，毛尖譯：《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 ② 賀蕭(Gail Hershatter)著，韓敏中、盛寧譯：《危險的愉悅：20世紀上海的娼妓問題與現代性》（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 ③ 王笛：《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與微觀世界(1900-1950)》（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 ④ 阿倫特(Hannah Arendt)著，王寅麗譯：《人的境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頁175。
- ⑤ Joan Judge, *Print and Politics: "Shibao" 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唐小兵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講師